

西南宋元山城调研成果的集成

——《巴蜀地区宋蒙山城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序

孙华

“巴蜀”是四川地区的传统地理称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范围。南宋时期的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这四路是益州路(成都府路)、梓州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其首府分别在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四川省三台县、陕西省汉中市、重庆市奉节县,其疆域包括了今重庆市全部、四川省大部、贵州省大部、陕西省南部和甘肃省东南部。

南宋端平二年(1235),蒙古大汗窝阔台在第二次西征的同时,分兵南下攻宋,其攻宋主力在皇子阔端率领下主攻四川。为了守住四川这个南宋王朝疆土的上游屏障,南宋王朝加紧了四川地区的防御部署,开始利用山河之险筑城设防。嘉熙四年(1240),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修筑重庆城。淳祐三年(1243),南宋王朝将四川军政中心四川制置司治所由成都迁至重庆,余玠被调任四川安抚制置大使主持四川军政事务。他根据当时严峻的形势,充分征求朝野熟悉战区蜀籍人士的意见,在四川境内三条纵向大江(由东到西分别是嘉陵江、沱江和岷江,这三江又分别以距离当时中心地区的远近被称为内水、中水和外水)以及三江汇合后的横向大江即长江沿岸险要的地点修筑山城和水寨,将当时无险可守的府州以上的行政建制单位迁到这些山城中去,以遏制蒙古骑兵优势的发挥。从而建成了以山水城池为点,以江河为线,点线结合,相互策应,有一定纵深军政合一的山城体系。依托这一山城体系,宋蒙双方在巴蜀地区相持了30余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历史的发展进程。由于南宋四川山城体系的营建及其以后南宋及蒙元双方在四川地区的兴筑,山城水寨总数达83处(绝大多数为南宋营建)。这些山城水寨遗址在南宋灭亡后,除了渠县礼义城等33处由元军继续驻扎外,其余已经悉数拆毁。元亡以后,即便是这些未被拆毁的山城,也都荒废颓败,成为遗址。由于宋元山城多建在不易生产和生活的山上,这些山城废弃后的城址大多没有被占作他用,城址大多还完整保存,不少宋代城墙还保留在地表,并有9座宋代城门保存下来,为现代研究宋元战争史、城市史、城池史以及山城所在区域的地方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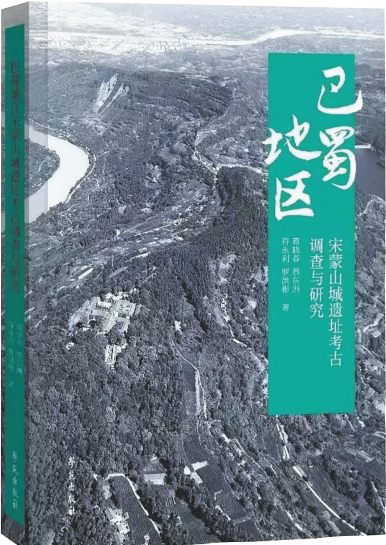
四川宋蒙山城,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实地调查和系统研究。早年进行的调查主要是重点山城的文献记载与遗址实物的区位比对,基本确认了文献记载的山城的现地位置及其地表状况。在此基础上开展的调查,则是从这些山城遗址的现状入手,通过观察这些山城的规模、形态和结构,认识当时修筑山城是否考虑过城市的行政建制规格,认识当时筑城的区位选择与地貌选择,认识这些规划和选择在防御作战实践中的检验、修补和强化等问题。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城堡研究中心从2013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巴蜀宋蒙山城遗址的实地调查,课题组在蒋晓春教授等的带领下,经过多年辛苦的田野工作,基本上跑遍了川渝陕甘黔四省一市即南宋四川辖区已知山城地点,完成了50处山城遗址的调查,基本掌握了这些宋蒙山城遗址现状地面的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蒋晓春教授及课题组的蔡东洲教授、符永利教授和罗洪彬博士等,还对南宋山城的历史背景、分级分类、尺度规模、军民人数,重要山城的攻防史实、相关人物、重要文物等开展了不少专项研究,其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巴蜀地区宋蒙山城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以下简称《宋蒙山城》)一书。该书与已经出版的《南宋川渝陕军事设施

的调查与研究》(重庆出版社,2020年,以下简称《南宋山城》)是姊妹篇,结合前书来阅读该书内容,更有助于对该书的理解。

《宋蒙山城》基于课题组亲自调查过的43处宋军山城和7处蒙军山城的田野资料,以及课题组成员发表的大量宋蒙山城研究论文,将这些调查材料和研究成果组织成七个部分,除了“绪言”和“结语”外,主体分为五编。开篇的绪言是对川渝宋蒙山城相关的概念进行定义,对调查研究的历史进行回顾,对调研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并对调查川渝宋元山城的思路、技术、对象和研究情况进行概述。第一编“历史与现状”,对宋蒙战争以前巴蜀地区的筑城历史、宋蒙战争时期南宋四川修筑山城的历史背景、宋蒙双方在巴蜀修筑山城情况和使用山城情况、宋蒙山城废弃后的后世利用情况,以及宋蒙山城的保存现状进行了概括的叙述,为以后详细描述这些宋蒙山城遗址的现状做了铺垫。第二编“宋军山城遗址”,按照江河上下和流域区位的顺序,依次对金堂云顶城、剑阁苦竹隘、苍溪鹤顶堡、苍溪大获城、南充青居城、通江得汉城、巴中平梁城、富顺虎头城、泸州神臂城、合川钓鱼城、渝中重庆城、奉节白帝城这12处重要山城进行叙述。第三编“蒙军山城遗址”,重点详述武胜城,再简要叙述其他5座蒙军山城。第四编专题研究部分,分别由外至内、从大到小论述了巴蜀地区宋蒙山城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余玠营建的四川山城体系、宋军山城的外围城防系统、宋军山城的内部结构、宋蒙山城的城墙和城门、蒙军山城的特点、巴蜀山城相关碑刻、宋蒙山城与高句丽山城,提出了不少有新意的见解。第五编则是巴蜀宋蒙山城申遗的专题,按照“申遗”文本的体例,就巴蜀宋蒙山城“申遗”的适用性标准、突出普遍价值的表述、真实性和完整性声明,尤其是“申遗”的思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阐述了宋蒙山城体系组成系列遗产联合“申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宋蒙山城》一书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不少创获,这些特色和创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宋蒙山城》是一部南宋典型山城的调查资料的汇集。书中的山城资料绝大多数都是课题组亲自调查搜集的第一手资料,资料翔实,叙述清楚,连同《南宋山城》书中的山城资料,构成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巴蜀主要山城调查资料的汇集。调查的最基础工作就是了解这些山城的基本情况,包括山城位置、环境、规模、格局、节点、文物、关联等现状信息,这些信息必须通过系统的实地踏查和记录才能获得。课题组调查时间既长,调查范围又广,参与师生也多,且田野调查与专题研究结合紧密。这既为巴蜀宋蒙山城遗址的进一步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南宋四川山城体系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有助于学术界和公众认识和了解南宋四川山城的现状和价值。

其次,《宋蒙山城》一书是目前所知最全面报告和研究蒙元山城的论著。通过该书我们可以知道,蒙元山城营建集中分布在渠江汇入嘉陵江前的两江河段,以及渠江



下游以南的平行岭谷的山口,具有控扼嘉渠两江、截断宋方联系、围堵宋方据点的作用;蒙军山城以水陆交通的地理区位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山岭险要程度和城防完善程度不及南宋山城,这正符合蒙军以守为攻、以城制城的军事思想;蒙军山城内建筑遗存相对较少,缺乏文教建筑和居住设施,军营驻地色彩浓厚,不具备南宋的主要山城同时兼具建置城市和军事据点的双重功能。诸如此类信息,都有助于宋元山城和宋元战争史的研究。

再次,课题组对巴蜀宋蒙山城的调查,是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城堡研究中心科研和研究生培养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在开展巴蜀宋蒙山城调查时,基于前期梳理资料的所得、调查过程中的发现和资料整理时的收获,课题组设置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宋蒙山城》一书就是这些课题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以南宋山城选址的宏观研究为例,该书从水陆区位、山形地势两方面对比分析了余玠任职以前和以后的山城,指出余玠规划建设的山城“没有一座山城既不临水路也不临陆路”,且更倾向于利用水路;余玠规划营建的山城偏重于选择方山地貌,“16座山城中有15座属于方山山城”;这些山城绝大多数都不很高大,体现了退守进攻的积极防御思想。这些分析和研究结论,无疑有助于中国古代筑城史的研究,值得关注。

最后,关于巴蜀宋蒙山城体系“申遗”的问题。该书在南宋43处山城中只选取12处作为代表,在蒙军7处山城中也只重点叙述其中1处,结合第五编关于巴蜀宋蒙山城联合申遗的阐述,可以知道该处选择应该隐含了“申遗”选取哪些山城遗址作为系列遗产构成的一种建议方案。此外,课题组对具有代表性的宋蒙山城特点和意义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他们概括宋蒙山城的选址就有这样的归纳:除钓鱼城外,“其他宋蒙山城的选址也各具特点,各领风骚。白帝城扼川峡之口,进退裕如;重庆城两江环抱,崖高顶阔;神臂城三面环江,巍岩峭立;苦竹隘四面悬绝,一径可登;得汉城三面险绝,逐层拔高;皇华城四面环水,控扼中流”。这些概括都是颇为精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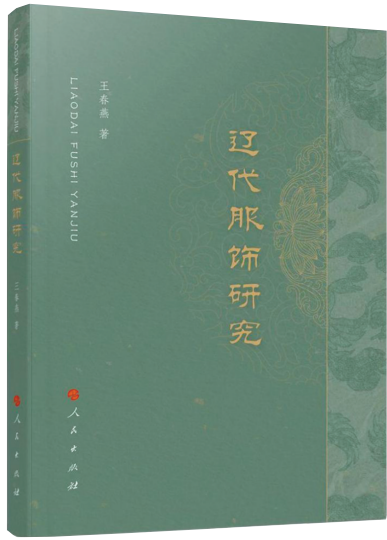
当然,《宋蒙山城》一书作为一部集体成果的集成,不同作者所见材料和研究方面的不同,自然也会在行文中有所反映,该书也因此还存在前后照应不周、行文表述不一,以及个别表述不准确的少许瑕疵。以上是我翻阅《宋蒙山城》书稿所获印象,可能挂一漏万,敬请读者谅解。

本文为《巴蜀地区宋蒙山城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序,有删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巴蜀地区宋蒙山城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
作者:蒋晓春 蔡东洲 符永利 罗洪彬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读《辽代服饰研究》有感

朱玉洁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一大批辽墓资料呈现在我们面前,辽代墓葬中壁画资料十分丰富,目前可见的已有约九十多座。辽墓壁画内容十分广泛,包含各种生活场景、神话故事等,其中的人物服饰更是蕴藏着许多历史信息。辽代服饰上折射出诸多的文化因素,既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特色,又借鉴、融合了各种文化因素。辽代服饰在继承本民族特色时,也与汉文化因素互相影响,在一些地区的壁画墓中可以看到存在契丹服汉化与汉服契丹化的情况。辽代服饰作为中国古代服饰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上承唐、下接宋,许多宋、金时代的服饰文化因素都可在此找到源头,其服饰面貌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近年来,汉服文化大放异彩。在辽政权存续范围之下的汉服亦有其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融合周边民族的文化因素。服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族文化

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当前学界服饰史的研究著作主要有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黄能馥和陈娟娟的《中国服饰史》、黄士龙的《中国服饰史略》、高春明的《中国服饰史》、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等,这些著作多论述中国古代从古至今的服饰发展变迁过程,辽代服饰仅为其中一章内容,对于辽代服饰的介绍也较为简洁,并且这些著作也多从历史文献角度来论述介绍辽代服饰的发展。《辽代服饰研究》首次从考古学视角来考察分析在辽政权统治下的各个地区的服饰面貌。

此外,与服饰相关的服饰饰物的研究,诸如金银器、玉器、琥珀等,在近年来也有大量相关著作与论文问世,这为解读分析服饰的发展演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翔实

《辽代服饰研究》概述

王春燕老师所著的《辽代服饰研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8年度西部项目“草原丝绸之路视域下的契丹服饰研究”的重要成果,202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内蒙古、辽宁、山西、河北等地的辽墓壁画及出土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类型学分析、历史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详细论证了辽代服饰发展的动态过程。该书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辽代服饰的主要发展历程,包括辽代服饰的类型学分析、辽代服饰的社会性、辽代服饰的时空变迁、辽代服饰的文化交流。涉及了契丹族本民族的服饰文化传统,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原汉文化、北方民族、周边民族的交流融合。

辽代服饰中的本民族特色

辽政权是由契丹族所建立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服饰面貌上也保留了较多的本民族特色,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其发式——髻发。作者在该书中对辽五京各个区域内的髻发根据其剃发位置和所存留的发量都做了详细的类型学分析。此外,契丹人的民族传统服饰为袍服,在辽墓壁画中也有所反映。契丹人的传统服饰吊装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北宋的服饰面貌,北宋朝廷甚至一度下令禁止此种服饰的穿着。契丹族的传统服饰及其组合搭配在辽上京地区分布较为集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上京地区的人群构成情况。

辽代服饰中的民族文化交流

通过论述辽代服饰的组合搭配,可以看到辽代服饰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其他民族的服饰文化为自己所用,在服饰面貌上呈现出了一定的杂糅性。这在辽西京、辽东京等地的壁画墓中都有所反映。并且在一些出土的衣物上还出现了左右衽可开的情况,左右衽自古以来便被认为是“华夷之辨”在服饰上的体现,而这种淡化左右衽的情况,作者认为是契丹人与汉民族不自觉融合的一种体现。与此同时,在文化因素的互动中,中原汉文化、鲜卑文化、突厥文化、室韦文化、西夏文化等都对辽代的服饰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辽代服饰研究》的特点

该书还有着一些独有的学术特点:

在类型学研究方面,该书对于辽五京各区域内的服饰资料均进行了详细的分区分类及组合搭配研究。并且在辽代壁画墓分期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辽代服饰的时空变迁。虽然目前学界已有不少关于辽代服饰及其相关的研究,但作为辽代服饰的专著,较为系统地使用考古学类型学方法的目前还较为少见。与其他介绍辽代服饰著作论文不同的是,本书将辽代服饰按照辽五京的地域范围进行划分,关注辽代服饰在发展过程中的地区性差异。

在分析视角方面,作者以辽代服饰为切入视角,进一步观察论证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以服饰文化为载体,反映其社会生活、文化交流、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的历史,对研究辽代的社会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辽代服饰不仅包含其本民族的传统特色,也在发展过程中渐渐吸收了中原汉文化,通过服饰反映了当时辽宋之间的文化互动,从服饰视角论证了辽政权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

在研究资料方面,该书所使用的研究资料主要为辽代壁画墓图像资料及出土遗物,这些都是通过考古发现所获得的。在该书第一章每小节按地区做类型学分析前,作者都十分详细地罗列了该区域内地主要的辽代壁画墓信息。该书所收集的关于辽代服饰的考古学资料在目前学界所见的各种相关著作和论文当中是较为全面的。可见,在资料搜集和整理方面,作者真正地做到了“竭泽而渔”。该书的附录占全书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其所附的“辽墓壁画服饰统计”“墓葬壁画人物服饰表”为读者提供了全面的辽代服饰考古学资料,也为之后的学者进行辽代服饰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资料基础。

服饰同时也是美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辽代服饰研究》一书定位于考古学视角,广泛搜集文献史料、墓葬壁画图像资料、辽代出土遗物资料,运用考古学类型学分区、分期的研究方法分析探究辽代服饰发展的总体特征和时空演变过程。这也为历史学、美术史等方面研究辽代服饰制度提供了新的视野。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辽代服饰研究》
作者:王春燕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汉代信仰世界的折射

——《昆仑之上:汉代升仙信仰体系的图像考古》序

霍巍



汉代社会信仰世界的变迁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从纵向上看,对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思想多有继承和发展;从横向上看,西域传入的佛教、本土兴起的道教几乎同时对这一社会交互产生影响,注入了许多新的因素。就其内部结构来看,如同余英时所指出的那样,还可以分为“高层次(或正式的)思想”和“低层次(或民间的)思想”,或如葛兆光所说的“精英和经典”以及“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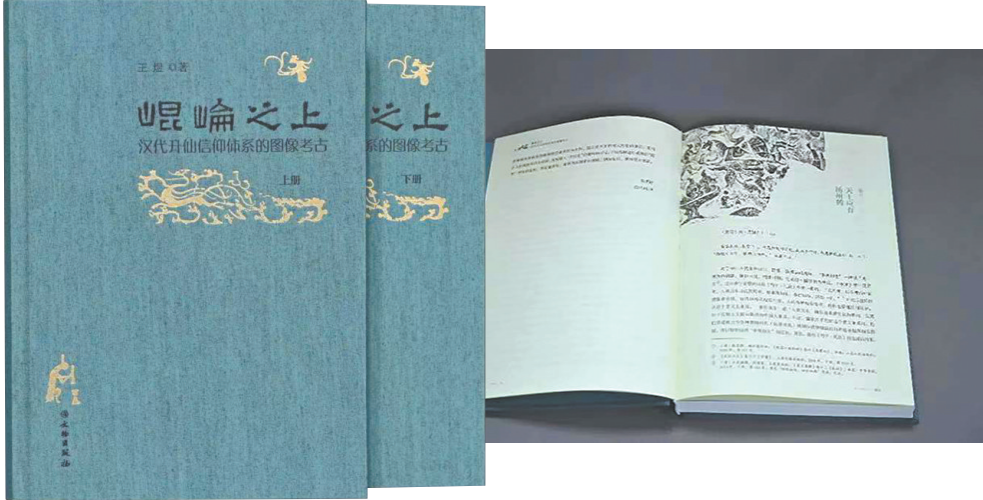
在汉代信仰世界之中,一个最为引人瞩目的话题,是人们如何看待生与死,如何想象死后的世界。人能够长生不死吗?如果不能,那么死后灵魂是否有知?如果灵魂有知,它的去向又该如何?肉体 and 灵魂会是相互分离,还是合为一体?生者与死者之间应当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各种方术、服食以及修炼能否有助于长生不死或死后升仙?这一系列问题是汉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罗大众都普遍关心的话题。

王煜的这部名为《昆仑之上:汉代升仙信仰体系的图像考古》的新著,是在他十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来的。与既往的研究成果相比较,我个人认为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他自己的认知逻辑和叙事体系,将过去零乱、分散、单一的汉代考古图像考证进行了精心的梳理和整合,对于以昆仑神话为中心的汉代升仙信仰体系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理、不同的面向展开了精彩

论证,将过去许多看似关联度不高的考古现象加以联系和阐释,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

他在广泛联系相关文献材料和考古图像的相互对比之后,逐渐建立起一个以昆仑、天门、西王母和天神为中心的信仰体系。大体而言,他认为西北方的昆仑一方面是天地最接近之处,另一方面又是时人认定的“天地之中心”“天之中柱”,也是登天最为重要的天梯;昆仑之门在西汉前期的楚地还只是“始升天之门”,求仙者从这里开始升天的旅程,而到了西汉中晚期尤其是东汉时期以来,昆仑之门即是天门,成为天界的入口。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以来,原本拥有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也加入这一信仰体系中,凡夫俗子要想进入天门、升入天界,还需在西王母那里获得仙药和仙籍。西王母的地位由此得到极大的提升和肯定。接下来他重点讨论了“天界”,这是以正对昆仑之上的北极星太一(天皇大帝)所统领的地方,人们虽不敢奢望能得拜太一,甚至太一能遣天马、象舆来迎,但还可以通过众多天神的引导以及在风雨雷电诸神的护卫之下,顺利地、风光地升天成仙,在“天堂”过上永远快乐的日子。

王煜在书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性的论述在于:汉代昆仑升仙信仰中有升天成仙的理论背景,有升天成仙的基本过程,又有天界的主神太一及其从属等,俨然已经形成一个系统——或可称其为“昆仑神话系统”。基于这一认识,他进而对汉代考古资料中出现的其他一些图像和昆



仑神话系统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更深一层的探索。例如,他认为汉代凿通西域之后,出于时人对于西域地理、人文等各方面知识的进一步认识,开始将目光从传统的中土延伸到域外,由此在关于西方的昆仑神话体系中出现了各种新的事物。

面对这样一个如此庞杂、多元的信仰世界,王煜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他的这部著作仅仅揭开了深潜于大海之下的冰山一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本书虽然也是关于信仰系统的讨论,但重在形成,而略演变;强调全社会趋同,而忽视地域、阶层的特点;着力梁柱架构,而搁置基石、瓦顶;所论者仙,所避者鬼,所忽者人。”此可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我们可以期许,即使他本人可能因为研究目标和重心的转换而在学术研究上另有阶段性的安排,但他和他所指导的学生、四川大学历史时期考古这个团队中的同仁,是一定会有贤者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把这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题目做下去,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希望总是会有。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昆仑之上:汉代升仙信仰体系的图像考古》
著者:王煜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